

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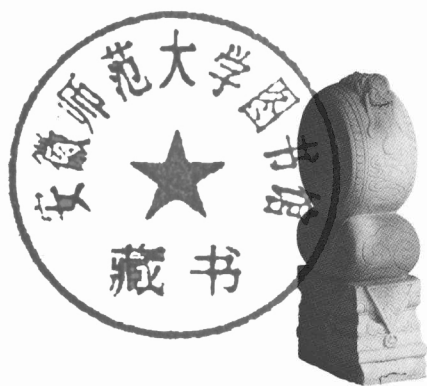
郭学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

郭学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郭学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390 - 9

I. ①唐… II. ①郭… III. ①家族—研究—聊城市—唐宋
时期 IV. ①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1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李 斌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综论	(1)
一 聊城地域文明的早熟性	(1)
二 汉魏至明清聊城仕宦家族概述	(2)
三 聊城地域仕宦家族兴盛的区位优势	(13)
四 汉魏至明清聊城仕宦家族文化特征	(20)
五 学术研究综述	(31)
第二章 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	(39)
一 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先世考略	(39)
二 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发展	(57)
三 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文化	(82)
第三章 宋代大名莘三槐王氏家族	(111)
一 三槐王氏祖源及先世考略	(111)
二 宋代大名莘三槐王氏家族的崛起与发展	(133)
三 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兴盛的时代特征	(169)
参考文献	(205)

第一章 综论

一 聊城地域文明的早熟性

聊城位于山东省西部地区，是黄河下游开发较早的地域，也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从历史上看，聊城历史悠久，其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生发性早的特点。据考古发掘资料得知，距今 7000—6000 年，聊城地域就已有人类居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聊城所属的茌平、东阿、阳谷三县境内先后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 17 处，在西南自阳谷县寿张镇张村起、东北至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村北的狭长地带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45 处。其中在聊城境内发现的 17 处大汶口文化古遗址中，除大碾李遗址外，其他 16 处古遗址依次分布在从阳谷县东南部的皇姑冢，向东北延伸，经过东阿县到达茌平县城东北的望鲁店，在这一西南至东北走向的狭长地带里，分布着阳谷县皇姑冢遗址、阿城王庄遗址，东阿县邓庙遗址、香山遗址，茌平县高垣墙遗址、教场铺遗址、大尉遗址、乐平铺遗址、南陈遗址、梁庄遗址、十里铺遗址、韩王遗址、尚庄遗址、台子高遗址、大刘庄遗址、望鲁店遗址。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由阳谷县东南部经东阿、茌平，一直延续到禹城县境内的西南、东北走向的古河道两侧的高台地上，离河近，易于取水，地势高，不怕水淹，比较适合原始人类居住。从这些古遗址分布的规律性可以看出，早在 大汶口文化时期，聊城境域就有人类活动。在这些古遗址中，阳谷县阿城镇的王庄遗址是聊城境内发现时间最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1995 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距今约 6000 年、被史学界称为“王庄城”的城址。王庄城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城，“城垣夯土特别典型，层位关系十分明确”，是国内

2 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

首次发现的“早到 6000 年的城，是孤例”^①。文明社会的标志性因素很多，学界一般认为，城、文字和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性因素。据此而论，位于阳谷县阿城镇王庄城的发现，无疑反映了早在 6000 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早期，聊城地域已进入早期文明时代，同时也体现出聊城地域文化生发性早的特性。正是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聊城龙山文化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文明特征已特别突出。从在聊城发现的 45 处龙山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不仅生产工具改进、农业发展、制陶业技术先进，而且发现了带有文字的陶片，特别是在聊城发现的景阳冈和教场铺两组 9 座龙山文化城中，既有面积较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被认为是“都城”的中心城，也有面积较小、文化内涵相对薄弱的小城——邑，邑城之外又有一些只有壕沟而无城墙的聚落，由此在聊城区域龙山文化遗址中形成了“都、邑、聚落”三级居住方式^②。“都、邑、聚落”三级居住方式，更凸显了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时期聊城地域文明发展的早熟性。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皆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上述聊城境内发现的文化遗址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无疑亦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聊城地域文化已经兴起。

二 汉魏至明清聊城仕宦家族概述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聊城形成了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与山东其他区域相比，聊城地域文化除了生发性早特性之外，另一个突出特性便是世家望族辈出。自汉魏之际开始，聊城世家望族便不断涌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汉魏之际高唐崛起的华氏家族，魏晋时期清河（临清东北）的崔氏家族，隋唐时期魏州观城（今莘县观城镇）的刘氏家族、魏州冠氏（冠县）的路随家族和路季登家族、博州武水（今山东聊城市西南）的孙氏家族，宋代大名莘（莘县）的三槐王氏家族。进入明清时期，聊城东昌府更是产生了“阁老傅”家族、“御史傅”家族、任氏家族、邓氏家族、朱氏家族、耿氏家族、杨氏家族等十余家门望族。从

① 《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9 页；参见程玉海主编《聊城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4 页。

② 参见程玉海主编《聊城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9—20 页。

对以下几个典型家族的概述中不难看出，自汉魏至明清聊城出现的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仕宦家族。

（一）高唐华氏家族

高唐华氏家族崛起于汉魏之际，其家族崛起的核心人物是华歆。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聊城市高唐县）人。东汉末年华歆举孝廉入仕，历任郎中、尚书郎、豫章太守、参司空军事、侍中、尚书令。魏国建立后，华歆历仕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先后出任御史大夫、司徒、太尉，进封博平侯。华歆作为汉魏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无疑奠定了华氏家族在魏晋官宦世家的显赫地位。从华歆之后，魏晋华氏家族子孙大多在朝中担任要职，为朝中显宦。华歆长子华表，年二十余便成为魏散骑侍郎，仕晋之后，历任太子少傅、太常，拜光禄大夫致仕；次子华博，历任三县内史；三子华周，历任黄门侍郎、常山太守。华表有三子，均为朝中显官，长子华廙历任西晋中书通事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前军将军、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光禄大夫、尚书令、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次子华峤为秘书监、尚书；三子华漉为河南尹。华廙长子华昆官至尚书，次子华荟为河南尹，三子华恒为左光禄大夫开府。华漉之子华轶，官至江州刺史。自华歆至华昆、华轶，华氏家族四代为朝中显要，高唐华氏家族已成为魏晋时期显赫的官宦世家。

（二）清河崔氏家族

清河崔氏家族是魏晋时期由贫寒起家的显赫仕宦家族。《北史》史官在叙述这一家族的核心人物崔光时说崔光为“清河（今山东临清市东北）人……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①。从《北史·崔光传》记载得知，崔光祖父崔旷、父亲崔灵延生前分别仕宋为乐陵太守和长广太守，是官位不高的地方官。从崔光“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的记载可以看出，到崔光父亲崔灵延时，崔氏家境已经比较贫寒，以至于靠崔光“佣书以养父母”来维持家庭生活。然而正是靠着崔光的刻苦好学和自立，到崔光时清河崔氏家族迅速崛起。据《北史·崔光传》记载，北魏太和六年（482），崔光拜中书博士、著作郎，之后仕途一路

^① （唐）李延寿：《北史》卷44《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5页。

升迁,先后出任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太子少傅、侍中、太常卿、齐州大中正、中书舍人,从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开始,又先后迁任中书监、太子少傅、右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崔光升任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如故。去世后,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崔光自入仕后“历事三朝,师训少主,不出宫省,坐致台傅”,在当时可谓荣光无限,“斯亦近世之所希有”^①。自崔光而后,清河崔氏家族子孙大都为朝中显宦。如崔光之子崔劼,举秀才入仕,历任中军彭城王参军、秘书郎中、中书侍郎、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太尉长史,去世后赠侍中、卫将军、青州刺史。崔光弟弟崔劼,魏末累迁中书侍郎,东魏兴和三年(541)之后,历官通直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国子祭酒、直内省、南青州刺史、秘书监、齐州大中正、五兵尚书、南兖州刺史、度支尚书、仪同三司、中书令等职,去世后赠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崔光侄子崔鸿,历任尚书都兵郎、三公郎中、司徒长史、员外散骑常侍、中散大夫、前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去世后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崔鸿之子崔子元,官至秘书郎。崔光从祖弟崔长文,累迁平州刺史。崔长文从弟崔庠,官至东徐州刺史,去世后赠骠骑将军、吏部尚书。

(三) 魏州观城刘氏家族

魏州观城(今山东莘县观城镇)刘氏家族是唐代显赫的世家望族,这不仅是因为其家族成员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子孙^②,更是因为其家族成员在唐代出现了三个宰相。

唐代观城刘氏家族第一代为魏州观城人刘林甫,唐高祖武德年间先出任内史舍人一职,典掌机密,后因参与唐律撰定著《律议》万余言而擢

① (唐)李延寿:《北史》卷44《崔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②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8载:“广平刘氏,出自汉景帝子赵敬肃王彭祖,生阴城思侯苍。苍薨,嗣子有罪,不得立,遂居广平肥乡。苍十一世孙邵,字孔才,魏散骑常侍。十一世孙藻,生矜,兖州刺史。矜孙林甫,中书侍郎、乐平男。林甫生祥道、庆道、应道。祥道相高宗,生齐贤,更名景先,亦相高宗。应道,吏部侍郎,生令植、元勉。令植,礼部尚书,生京兆少尹孺之。孺之生从一,相德宗。元勉,括州刺史,生胸山丞如璠。如璠生乃,字永夷,兵部侍郎、正惠公。乃生伯刍,字素芝,刑部侍郎。伯刍生宽夫,字盛之,泽潞掌书记。宽夫生允章,字榘中;焕章,字文中;元章,字求中。”

拜为中书侍郎。唐太宗贞观初年，又改任为吏部侍郎。刘林甫之子刘祥道，唐高宗永徽年间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唐高宗显庆年间又先后迁任黄门侍郎、司刑太常伯，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拜右相，从而登上宰相高位，成为刘氏家族第一位宰相。刘祥道之子刘齐贤，承袭父亲爵位后，起初以侍御史身份出任晋州司马，之后累迁黄门侍郎。高宗永淳元年（682），刘齐贤继其父又升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刘氏家族第二位宰相。刘氏家族第三位宰相是刘从一（刘祥道弟弟刘应道的曾孙），他由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先后出任渭南尉、监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员外、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唐代观城刘氏家族“自祥道至从一，刘氏凡三相”^①，成为唐代历史上典型的门阀士族家庭。唐代观城刘氏家族其他成员大都任职于中央机要部门，像刘祥道弟弟刘应道，官至吏部侍郎；刘应道之子刘令植、刘元勉，分别官至礼部尚书和括州刺史；刘令植之子刘孺之，官至京兆府少尹；刘元勉之孙刘乃，官至兵部侍郎；刘乃之子刘伯刍，官至刑部侍郎。《新唐书》对观城刘氏家族这样评价说：“齐贤三世至两省侍郎，典选。从父应道吏部郎中，从父弟令植礼部侍郎，凡八人前后历史部郎中、员外，世以为罕。”^②唐代观城刘氏家族前后7代人为朝中显宦，史书所讲的“世以为罕”并非虚夸溢美之词。

（四）魏州冠氏路季登家族

魏州冠氏（今山东聊城市冠县）路季登家族之所以在唐代名闻于世，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其族人路季登及其子路群、路庠、路单及其孙路岳、路岩祖孙三代6人皆进士及第，并为朝中显宦，其中路岩在36岁荣登相位。路季登，阳平寇氏人，唐代宗大历六年（771）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官至尚书郎、左谏议大夫。令路季登颇感自豪的是其三子路群、路庠、路单皆登进士第，其中路群进士及第后，累佐使府，入朝历任监察御史、兵部郎中、谏议大夫、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要职。路群二子路岳、路岩，则在宣宗大中年间（847—860）进士及第。路岳历任两郡刺史，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25《刘从一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14页。

②（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106《刘祥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51页。《旧唐书》卷81《刘祥道传》则谓：“景先自祖、父三代皆为两省侍郎及典选，又叔父吏部郎中应道、从父弟礼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后为吏部郎中员外，有唐以来，无有比之。”

后入朝出任给事中；路岩累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仅36岁的路岩荣登相位，以本官同平章事。路岩在相位任职8年，累兼左仆射。路季登家族一门三代皆进士及第，在科举取士人数还十分有限^①的唐代，这样的情况可谓凤毛麟角，也难怪《旧唐书》将路季登家族成员与一些“衣冠人物，门族昌盛”、“有子有弟，多登宰辅”^②的“盛族”成员放入同一传记中立传，由此亦可以窥见唐代魏州冠氏路季登家族的昌盛。

（五）魏州冠氏路随家族

唐代魏州冠氏路随家族亦是门第显赫的望族。其家族不仅五代仕宦，而且其家族的核心人物路随官至宰相。从《旧唐书·路随传》记载中可以了解到，路随高祖路节，唐高宗朝为越王府东阁祭酒；曾祖路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父路俊之，官至太子通事舍人；父亲路泌，唐德宗建中末年，举书判科中高第，先后出任城门郎、副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到第五代路随，路氏家族发展到兴盛时期。路随（775—835），字南式，阳平冠氏（今山东冠县）人，历仕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先后出任左补阙、起居郎、司勋员外郎、司勋郎中、侍讲学士、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翰林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崇文馆大学士、太子太师，唐文宗太和九年（835），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旧唐书》史官评价路随“自宝历初为承旨学士，即参大政矣。后十五年在相位。宗闵、德裕朋党交兴，攘臂于其间，李训、郑注始终奸诈，接武于其后。而随（路随）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③，对身居朝臣朋党旋涡之争而又能“藏器韬光，隆污一致”的路随大加赞扬，故《新唐书》史官赞其“辅政十年，历牛、

① 从《文献通考·选举考二》中《唐登科记》总目所载唐朝逐年取士人数可知，唐代科举取士的人数都是在一位数到两位数之间徘徊，如高宗麟德元年（664），取进士3人，诸科2人；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取进士16人，诸科1人；僖宗乾符二年（875），取进士30人，诸科9人；昭宗乾宁元年（894），取进士28人，诸科3人。唐代取士人数最多的年份是咸亨四年（673），取进士79人。故《文献通考·选举考二》中谓：“今考唐每岁及第者，极盛之时不能五十人。”参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7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43页。

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59《路随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55页。

李、训、注用事，无所迎将，善保位哉”^①。

（六）东昌府“阁老傅”家族

东昌府“阁老傅”家族是兴起于明清之际的名门望族，其家族振兴的核心人物是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据傅乐成先生《傅孟真先生的先世》^②记载，傅氏先世原本为江西吉安府永丰人，明代中叶其先祖傅回祖仕宦山东东昌府冠县令，傅回祖任冠县令期满后返回故乡，但夫人李氏不愿随行。傅回祖有七子，乃留下三子，侍奉夫人，自携四子南旋。三子中一居冠县，一居博平，次子傅祥则随母亲李氏侨居聊城，自此傅祥便落籍聊城，子孙世代居于聊城。自傅回祖至傅思敬，傅氏家族凡历六世。在此期间，聊城傅氏家族除耕读外，大多经营商业，不显于世。至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渐始，傅氏家族开始荣显。傅以渐生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清顺治二年（1645），清廷首次开科取士，傅以渐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结果中一甲第一名进士，从而成为清代首科殿试状元。傅以渐中状元后，初任修撰、侍读等官，到顺治十一年（1654），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已登公辅之位。次年，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大学士。傅以渐状元及第，官运亨通，不到10年入相，以至于傅以渐“自以显荣太骤”，于是“盛年告归，杜门著书，深得老氏之学”^③。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是傅氏家族的兴盛时期，傅氏家族族人傅继勋、傅绳勋均为封疆大吏，而诸子多具才华，或以诗文书画名世，或以武技见称，可谓满门俊逸。特别是傅以渐的五世孙傅绳勋，嘉庆十九年（1814）考取二甲进士第47名，先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出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军机处章京、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广东琼州府知府、四川夔州知府、浙江盐运使、广东盐运使等职。道光年间，又先后出任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广东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浙江巡抚、江西巡抚。据有学者统计，自清朝开国至1911年终结，清代聊城傅氏家族计有进士6人：傅以渐、傅正揆、傅绳勋、傅浚、傅京辉、傅斯悻，有举人11人，拔贡11人。而自明朝成化后期至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聊城傅氏家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42《路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78页。

② 参见《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山东通志》卷28之4《人物四·傅以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族有姓名可考的国子监生计有 91 人、秀才 110 人。傅氏家族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其中正一品官 1 人、正二品官 1 人、从二品官 1 人、四品知府 3 人、正五品官 4 人、正六品官 1 人、从六品官 2 人、正七品知县 8 人^①。可以说,傅氏家族发展到清代,已成为鲁西一代声名显赫的世家望族。

(七) 东昌府任氏家族

兴起于明末清初的东昌府任氏家族,是明清时期一个由武转文的仕宦家族。任氏家族的始祖是任不齐,“追封任城伯,后祀孔子庙”^②。东昌府任氏家族的始祖是任义,元末明初,任义从军,因追随朱元璋平定天下有功,被授予明威将军、平山卫指挥使,后自任城迁居东昌府,成为东昌任氏家族的始祖。之后,任义之孙大都因袭军职,像任义之子任宏、孙任嵩,曾孙任铎,皆世袭平山卫指挥僉事、明威将军。大约自明代中期,任氏家族开始由武向文转变。明代中期,任义曾孙任镇被明政府授予礼部司务,自此以后,任镇子孙大都转入文职,任镇之子任昶为府庠增生,任昶之子任邦仕为州同知,赠光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加四级正一品;任邦仕之子任宗道,赠光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加四级正一品;任宗道之子任怀茂为太学生,官至刑部左侍郎;任怀茂兄弟五人有三人为太学生,一人为太仆太学生^③。在聊城任氏家族由武向文转变中,任怀茂之子任克溥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任克溥,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及第后,历仕顺治、康熙两朝,先后出任南阳府推官、吏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会试同考官、礼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通政司左通政等职。康熙十二年(1673),擢升刑部侍郎。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南巡途中驻跸东昌(聊城),曾亲幸任克溥所居园第,并“赐松桂堂榜。以克溥年将九十,赐刑部尚书衔”^④。自任克溥而后,任氏家族科第仕宦者不断。任

① 参见政协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昌望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101—102 页。

② (清)韩茝:《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加四级正一品加刑部尚书海眉任公墓志铭》,载政协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昌望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20 页。

③ 参见政协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昌望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2—3 页。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264《任克溥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922 页。

克溥有四子，皆由科第入仕。长子任耿昉，由监生入仕，历仕内阁中书科舍人、浙江湖州同知；次子任彦昉，由乡试举人入仕，官至江西抚州知府；三子任俊昉，由拔贡入仕，先后出任刑部云南主事、河南司员外郎、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四川东川府知府等职；四子任伟昉，由聊城岁贡候选翰林院孔目，曾出任湖北荆州府监利县知县。任克溥之孙、重孙也大多入仕为官。其中任克溥之孙任士理由聊城岁贡入仕，官至江西抚州知府；任克溥玄孙任兆熙及其任兆熙之子任郿佑，分别于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进士及第，皆出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一职。据统计，自任克溥以后，聊城任氏家族科举正途出身者数十人，任官至七品以上者达 20 多人^①，是一个典型的世代为官的仕宦家族。

（八）东昌府邓氏家族

东昌府邓氏家族是明清时代著名的官宦世家，其家族的兴起和发展与聊城任氏家族颇为相似。元末明初，祖籍为江西省南城县的邓瑜随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转战，因功被封为正三品的昭勇将军，驻守东昌。自此而后到第十代邓子荣，子孙有八代相袭此职（第二代邓瑜之子邓鏞早逝），这样在明代的聊城就出现了邓氏“一门九将军，世代守东昌”的佳话。邓氏家族在以武起家的同时，也在积极适应明清时期东昌府日益发达繁荣的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鼓励子孙走科举入仕之路。走科举入仕之路终于在邓氏家族第六代邓堂后代子孙身上得以实现。《邓氏家谱》有云：“邓堂为人谨厚……教子孙读书明理。其次子邦，孙守清、守渐落籍于此，皆登科举第，成为望族。”^② 邓邦作为邓氏家族通过科举之路博取功名的第一人，其本人“博学识”，虽然其获得的仅仅是“补诸生，以贡授莱州府学训导”^③ 的功名，但对邓氏家族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他开辟了邓氏家族“学而优则仕”之路，对后代子孙走科举入仕也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鼓励。也正是从邓邦以后，邓氏家族科第入仕者源源不断。邓邦长子邓守清，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先后出任襄城令、临洮府同知；次子邓守渐，则分别考取崇祯元年（1628）拔贡和

① 参见王志刚、金维民主编《聊城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1 页。

② 转引自政协聊城市东昌府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昌望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 2003 年版，第 27 页。

③ 同上。

崇祯六年（1633）副榜。清顺治六年（1649），对邓氏家族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和庆贺的年份，因为这一年，邓氏家族出了第一位进士——邓守渐之子邓秉恒。邓秉恒进士及第后，仕途畅达，先后出任昆山县令、永丰县令、户部主事、江西司员外郎、云南司员外郎、福建巡海道。之后，邓秉恒之子邓允燮，以岁贡授任山西山阴知县；邓允燮之子邓基圣，以贡生先后出任内阁中书、户部主事、员外郎、刑部郎中。康熙六十年（1721），又迎来了为邓氏家族发展史增光添彩的一年，而为其增光添彩的是邓秉恒曾孙邓钟岳，此年，41岁的邓钟岳以进士一甲第一名荣登状元，成为清代聊城历史上继傅以渐之后的第二位状元。而后，邓钟岳入翰林院任修撰，历仕雍正、乾隆二朝，先后出任江南副考官、江苏学政、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通政司参议、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江南正考官等职。邓钟岳状元及第，将聊城邓氏家族推上了发展的顶峰，也使聊城邓氏家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向发展的名门望族。

（九）东昌府“御史傅”家族

兴起于明代中期的聊城“御史傅”家族是清代时期著名的名门望族。家族振兴者是傅光宅。明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其好友傅光宅撰写的墓志铭有云，傅光宅“上世山西洪洞人，远祖居敬，国初徙聊城，六传而及米脂，则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学易，号肖岩，公举嘉靖辛酉省试，不仕，而以公贵，累赠中宪大夫，重庆府知府，更曰中宪公”^①。可见东昌府傅氏始祖为傅居敬，他在明代初期携家人从山西洪洞县迁居聊城；傅光宅之父傅学易，曾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取得省试科名没有入仕，但以其子傅光宅而累赠中宪大夫、重庆府知府。由此也可以看出，傅光宅之前，聊城东昌府傅氏族人官位不显，虽然从傅光宅祖父傅相则开始，傅氏家族渐渐兴盛，但傅相则当时只是一个官位八品的米脂县令。傅光宅的进士及第，则使傅氏家族获得了显赫地位。从傅光宅墓志铭中可知，傅光宅于清“隆庆庚午（隆庆四年，1570年）举省试高等，入游太学，试冠六馆，万历丁丑（万历五年，1577年）成进士”^②。傅光宅

①（明）于慎行：《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铭》，载（明）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六），《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明文书局印行，第62页。

② 同上。

进士及第后，先后出任灵宝县知县、吴县知县、重庆府知府、河南道监察御史、南京兵部郎中、工部郎中兼摄三篆内工河漕、按察司副使等职。傅光宅进士及第及其官至显宦，使傅氏家族一跃而成为清代东昌府的名门望族，之后的聊城傅氏族人科第仕宦者不断。

（十）东昌府朱氏家族

兴起于明清之际的东昌府朱氏家族是一个由贫寒起家的仕宦家族。明末，原籍安徽的朱鼎延与家人为避战乱从平阴迁居聊城。朱鼎延志向远大，勤奋好学，于崇祯十六年（1643）考中进士，而后仕宦于清顺治一朝，历仕礼部主事、郎中、云南道监察御史、太仆少卿、左通政、右通政、太常卿通政使、工部左右侍郎，最后官至工部尚书兼礼部侍郎。自朱鼎延而后，聊城朱氏家族连续八代 15 人考取功名，其中进士 5 人、举人 5 人、拔贡 3 人、贡生和增生各 1 人。在这进士 5 人中，朱鼎延嫡孙朱辉钰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朱续晔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及第，历仕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京畿道监察御史、两淮都转盐运使，督理贵州清军粮储道，授中宪大夫；朱崇庆道光二年（1822）进士及第，先后出任福建漳州知府、吏部主事、郎中、广东督粮道，授中宪大夫；朱学笃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中举人，咸丰九年（1859）又取得进士功名，咸丰朝历仕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同治年间先后出任国史馆协修和纂修、实录协修和纂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会试同考官、浙江道监察御史、甘肃宁夏知府、盐运使，授通议大夫、资政大夫；朱学钱咸丰十二年（1862）进士及第，官至户部江南司主事。聊城朱氏家族一门六进士，进士、举人代不乏人，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以科第传家的科举仕宦家族，故当时清代文人对朱氏家族有“父子祖孙同登乙榜，兄弟叔侄并列甲科”的赞誉。清代占地近 20 亩的聊城朱府大院恢宏壮观，宅门门额上高悬的“世进士第”和“传胪”六个大字，向世人展示了聊城朱氏家族科第功名的荣耀和辉光。

（十一）东昌府耿氏家族

东昌府耿氏家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仕宦家族，其始祖耿遼原隶属军籍，明朝初年由馆陶迁居聊城。从第四代族人耿明开始，聊城耿氏家族开始了由武向文的转化。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23 岁的耿明取得举

人的功名；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又一举考取进士。耿明进士及第后，历仕贵州道监察御史、湖州知府、江西左参政等职。在耿明的后代子孙中，耿明曾孙耿如杞传承了曾祖的科举入仕之路，先后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考取举人和进士的功名，历仕户部主事、方郎中、陕西参议、遵化兵备副使、太仆寺卿、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左都御史。耿明仕宦期间多有政绩，《明史》卷248为其立传。自耿如杞而后，聊城耿氏家族先后有多人取得科第功名。耿如杞有三子，长子耿含光、三子耿大光分别取得秀才和增广生员功名，其中耿大光历仕户部司务、刑部湖广司主事，授得官阶正六品的承德郎。耿如杞次子耿章光，则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考中举人，崇祯十年（1637）又考中进士，先后出任曲沃县令、香河县令、安州知州、易州知州、兵部武库司员外郎，最后官至正五品的尚宝寺卿。耿含光之子耿愿鲁，清康熙九年（1670）考取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耿愿鲁长子耿贤举，在科举功名的激励下，经过发愤攻读，也于清乾隆年间取得进士功名。这样，自耿明至耿贤举，聊城耿氏家族先后有五人取得进士功名。在先辈激励下，耿氏家族后人如耿大光次子耿愿愚、耿含光之孙耿雁举、耿雁举之子耿嘉平、耿雁举从孙耿锡观等数十人先后取得秀才、举人、国子监生等功名，并由此而步入仕途。称明清时期的耿氏家族为科第仕宦家族，可谓名实相符。

（十二）东昌府杨氏家族

东昌府杨氏家族是清代著名的仕宦文化家族，闻名中外的中国古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就是东昌府清代杨氏族人杨以增所建的私人藏书楼。“杨氏家族的为官始于明初临清卫指挥所，是一个世袭的武职。……所以终明一代，直到清初，杨氏家族没有科举显达的记录。自杨宪章（杨以增的远祖）官县文学，杨氏家族开始由武转文，并系统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文化教育。”^①自此以后，杨氏族人渐渐走上科第入仕之路，其家族亦随之发展和兴盛起来。杨以增父亲杨兆煜，为嘉庆三年（1798）举人。而作为进士出身的杨以增，无疑是振兴杨氏家族的关键人物。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出生于聊城东昌府的杨以增，先于嘉庆三年（1798）

^① 王志刚、金维民主编：《聊城文化通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2页。

获得举人身份，而后于道光二年（1822）取得进士功名。之后的杨以增仕途亨通，先赴贵州出任过权长寨同知、荔波和贵筑县知县、乡试同考官、兴义府和贵阳府知府，再调任广西左江道员、湖北安襄郢荆道员、河南按察使、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和布政使、陕西布政使、陕甘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自杨以增而后，杨氏族人为仕宦，许多为朝中高官。杨以增长子杨绍谷，曾任云南大理府通判；次子杨绍和为咸丰二年（1852）举人，同治四年（1865）又取得进士功名，先后出任过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军机处记名、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文渊阁校理、通议大夫等职。杨绍和之子杨保彝为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户部员外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三 聊城地域仕宦家族兴盛的区位优势

聊城地域世家望族的出现与兴盛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与聊城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

如开篇所述，聊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聊城地域文化就已兴起。正是在聊城地域文化的衍生、发展过程中，聊城地域的区位优势逐渐形成并得以确立。

（一）春秋战国时期聊城地域文化的形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与当时诸侯争霸、思想争鸣的历史大势相适应，这一时期的聊城也处于各区域文化的碰撞和融汇之中。春秋战国时期，聊城地处齐国、鲁国、晋国、卫国和宋国交界地带，各诸侯国的争霸战争和诸侯之间的会盟多次在聊城进行。战争一方面造成了聊城地域的动荡，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聊城地域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汇。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聊城辖区出现了许多重要城邑，如春秋时期齐国西部边陲地带聊城辖区出现的聊、桃丘、黄、北杏、柯、薛、夷仪、摄、清、重丘、高唐、辕、冠氏、棠、牧丘等城邑，战国时期聊城辖区出现的贝丘、博陵、灵丘、马陵、阳狐、阿等城邑。^① 城邑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

^① 参见程玉海主编《聊城通史·古代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51、65页。